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秦汉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秦汉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

秦汉时期，自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始，至 220 年东汉灭亡止，包括秦、西汉、新、东汉四个朝代，前后共历时 440 年。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甚至是空前的进步，第一次出现了封建社会鼎盛的局面。在这四百余年充满巨大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河北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昌盛的地区之一，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都经历过重建统一封建国家的战争。在这几次统一战争中，河北均攸关成败，举足轻重。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以后，全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为了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刘邦与项羽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刘邦屡战屡败，多次全军覆没，几为项羽所灭。一直到韩信破赵占据河北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是在垓下之战前夕，刘邦还曾被项羽大败于固陵。最后，刘邦主要是依靠韩信所率河北之军的支持，才得以战胜项羽做

了皇帝。西汉末年，刘秀北巡河北之初，身边不过只有几个随员而已，根本无法与绿林军、赤眉军、铜马军等农民军和各地的官僚地主武装相比。刘秀惨淡经营，历尽艰辛，奔走于河北各地，依靠信都、巨鹿、真定、常山等地的官僚地主武装，总算在河北站稳脚跟。尤其是在取得上谷、渔阳两郡突骑的支持和收编了河北的铜马军以后，刘秀才真正组织起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从而在全国各地的地主武装和农民武装中独树一帜，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续汉志》曰：更始时有童谣云：“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由此足见河北的重要。后来，刘秀也正是以河北为根据地，逐步统一全国的。东汉末年，河洛、关中历经战乱，破败不堪，河北又成了东方各路军阀的必争之地。时人逢纪说“冀部强实”，荀谡称“夫冀州，天下之重资”，沮授等亦云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①。曹操在占领邺城后还曾十分得意地对崔琰说：“昨案（冀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天下之大州也。”^②公孙瓒与袁绍连年争战，其用心无一不是把夺取河北作为夺取天下的跳板。曹操攻灭袁绍以后，也是以河北为根据地，进而统一北方大半个中国的。

同秦王朝时期实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两汉均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河北一直是诸侯王国分封最为集中的地区。另外，也出过不少后妃和皇帝。因此，中央政权同地方王国的斗争，中央政权内部的宫廷斗争，亦多与河北有关。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出生于河北的邯郸，其生母赵太后即为赵国之“豪家女”。灭赵之后，秦始皇曾亲临邯郸，“诸尝与王

《后汉书》卷 74 《袁绍传》。

《三国志》卷 12 《魏书·崔琰传》。

（秦始皇）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①。汉高祖在位时有镇压燕王臧荼、代相陈豨、燕王卢绾反叛的斗争，还有过废黜赵王张敖的举措。吕后专权时，曾相继毒杀、幽杀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等三个赵王。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出自清河观津，景帝时期和武帝初期，窦氏作为皇太后、太皇太后曾对当时的朝政产生重大影响。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赵王刘遂亦曾举兵参与其事。汉武帝所宠幸的李夫人出自中山，钩弋子（汉昭帝的生母）出自河间。汉昭帝时，还发生过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盖长公主和河间丁外人等联合谋反的事件。汉宣帝的生母、史皇孙的王夫人则出自涿郡蠡吾，在巫蛊之祸中与卫子夫、戾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等同时遇害。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出自魏郡元城。元、成、哀、平之世，王皇后及王氏外戚左右朝政达数十年之久。汉成帝时，还发生过中山王刘兴与定陶王刘欣争立太子的事件。及汉哀帝（即定陶王刘欣）即位，时中山王刘兴已死，但其母中山太后冯媛仍为傅太后（汉哀帝祖母）所诬愤而自杀，冯氏家族在中山受害者达数十人。汉平帝刘衍系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其母中山卫后亦为中山卢奴人。王莽不仅以汉平帝为傀儡，命中山卫后留居中山，阻隔其母子相见，而且还大兴冤狱，尽灭中山卫氏家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第一个皇后郭圣通，亦为真定藁县人。汉和帝时，清河王刘庆曾参与诛灭窦氏外戚的斗争。汉桓帝时，发生过清河刘文谋立清河王刘蒜的事件。汉灵帝时，勃海王刘悝被诬谋反而自杀，其妃妾子女被杀者多达一百余人。至于桓、灵二帝，则均出自河间。汉桓帝刘志，祖父为河间孝王刘恭，父为蠡吾侯刘翼。汉灵帝刘宏，系河间孝王刘恭之曾孙。

《史记》卷 6 《秦始皇本纪》。

祖刘淑，父刘苾，世封解渚亭侯。其生母董皇后，亦为河间人。汉灵帝即位后，还曾回河间置买田宅，起第观。当时，京都有童谣云“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春黄粱”^①，所说的也就是董皇后在汉灵帝即位后大肆聚敛金钱的事。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秦汉时期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最终在全国普遍确立的时期。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土地私有关系已合法存在，买卖土地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赵括拜将以后，即“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②。秦汉时期，土地私有主要表现为各类地主和广大自耕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无论是地主还是自耕农，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既可以买卖，也可以转让、继承。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③，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承认和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次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不无得意地宣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④，虽然不免有所溢美夸大，但也确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蓬勃发展的状况。但是，由于封建赋税剥削的苛重和地主经济的恶性发展，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流亡，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不少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缴纳十分之五的地租。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

《后汉书》卷 8 《汉灵帝纪》注引《续汉志》。

《史记》卷 81 《廉颇蔺相如列传》。

③ 《史记》卷 6 《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徐广曰。

④ 《史记》卷 6 《秦始皇本纪》。

之田，见税什五。”^① 据两《汉书》记载，河北地区也出现过许多豪强地主。例如：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②；昌城人刘植“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③；巨鹿宋子人耿纯，世为“巨鹿大姓”^④；鄱县的“大姓苏公”^⑤；汉光武帝皇后郭圣通之父、真定藁人郭昌“为郡著姓”，“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母弟”^⑥；光武即位，“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⑦；渔阳泉州人阳球，“家世大姓冠盖”^⑧。这些所谓的“大家”、“豪右”、“大姓”、“著姓”、“冠盖”就都是当地典型的豪强地主。再如，《幽州刺史朱龟碑》所题其故吏姓名，亦多为涿、蓟、上谷、右北平人士。^⑨ 东汉末年，汉灵帝尽管做了皇帝，还不惜返回河间老家“买田宅，起第观”，并且经常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⑩。这固然暴露了汉灵帝个人极端的贪婪与无耻，但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汉代河北的农业生产中封建土地私有关系确实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曾经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在这三次农民战争中，河北亦均有巨大的贡献。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河北各地人民群起响应，不仅相继建立起

《汉书》卷 24 《食货志》。

《汉书》卷 90 《酷吏列传》。

《后汉书》卷 21 《耿纯传》。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后汉书》卷 10 《皇后纪》上。

⑦ 《后汉书》卷 77 《酷吏传·李章传》。

⑧ 同上。

⑨ 洪适：《隶释》卷 10。

⑩ 《后汉书》卷 78 《宦者列传》。

以赵王武臣（后为赵王歇）、燕王韩广为领导的燕、赵政权及其反秦武装，彻底摧毁了秦王朝在河北的地方政权及其统治秩序，而且还将秦王朝军队的主力吸引到河北。秦末农民起义军同秦军主力之间有关双方生死存亡的战略决战，也正是在河北的巨鹿进行的。巨鹿之战前夕，赵王歇和张耳率领河北农民军不畏强暴，坚守危城巨鹿达数月之久，这就为因屡遭镇压而濒临失败的项羽、刘邦等领导的南方诸部农民起义军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巨鹿之战的胜利，则一举摧毁了秦军的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起义军同秦军之间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彻底宣判了秦王朝的死刑。新莽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河北各地也出现了大小数十部农民起义军。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铜马、五校、城头子路、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幡、五楼等部，众达数百万人。这些农民起义军虽然后来多为刘秀集团镇压和收编，但其足迹所至也沉重打击了河北地方的各级封建政权和地主贵族势力，促进了两汉之际河北和全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巨鹿人张角及其弟张梁、张宝等发动起来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与秦末农民大起义和王莽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在谪戍途中或在流亡之际仓促起事不同，这次农民起义不但在事先做了大量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而且还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鲜明斗争口号。因此，黄巾起义爆发后，旬日之间便席卷全国，形成了所谓“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①”的局面。在河北战场上，张角等率领冀州黄巾主力浴血奋战，多次打败东汉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的军队。广

^①《后汉书》志 28 《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阳黄巾还曾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这次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的腐败统治，有力地冲击了官僚地王和封建王侯势力，使东汉王朝在河北以及各地的地方政权陷于土崩瓦解之中。后来，张角猝然病死，黄巾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在东汉军队和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之下，冀州黄巾军大败于广宗，张梁与三万义军壮烈牺牲，五万人不肯投降赴河就义；又大败于下曲阳，张宝与十万义军全部英勇战死。这次农民起义虽然陷于失败，但同样起到了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充分体现了河北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极其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河北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交叉进行，形成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点，在河北地区尤为突出。早在战国时期，为防止匈奴骑兵南下，燕、赵两国就曾在其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秦汉时期，匈奴和后起的乌桓、鲜卑仍然不断南下侵扰，河北北部的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五边郡屡被其害。在《史记》和两《汉书》中，有关“匈奴入燕”^①；“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②；“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③；“匈奴‘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④；“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⑤；“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⑥；“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⑦的记载史不绝书。河北北部的一些分裂割据势力，如汉初

① 《史记》卷 10《景帝本纪》。

② 《汉书》卷 6《武帝纪》。

③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

④ 《后汉书》卷 90《乌桓列传》。

⑤ 《后汉书》卷 90《鲜卑列传》。

的燕王卢绾、代相陈豨、赵王刘遂，东汉初年的代王卢芳、渔阳太守彭宠，东汉末年的渔阳人张纯、张举，以及袁绍、袁尚父子等，也往往与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结盟，对中央政权和内地人民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危害。一般说来，秦汉历代中央政权在河北北边五郡均派有重兵防守。有不少名将特遣至边郡任职，主持当地军政事务。例如，汉武帝时，材官将军韩安国任渔阳、右北平太守，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汉昭帝时，中郎将赵充国率军驻屯上谷；汉宣帝时，赵充国又以后将军率四万骑驻屯北边九郡。东汉光武帝时，因匈奴、乌桓多次大举南下，北边形势紧张，除以讨虏将军王霸任上谷太守外，甚至还以建义大将军朱祐屯常山，横野大将军王常屯涿郡，捕虏将军马武屯下曲阳，伏波将军马援屯襄国，以备匈奴、乌桓。李广英勇善战，匈奴因号之曰“汉飞将军”，数年不敢入右北平界。王霸在上谷任职长达二十余年，匈奴南单于、乌桓皆降服，北边无事。毋庸讳言，汉民族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在河北北部地区曾经进行过多次战争。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更长的时期内汉民族与北边各少数民族之间还是一种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兄弟关系。在上谷的宁城（今河北万全），两汉均置有护乌桓校尉，负责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汉、匈之间多次缔约“和亲”，也确实起到了加强民族团结、民族联系的作用。在“昭君出塞”以后的六十余年间，就曾出现过“边城宴闭，牛羊布野，三世无吠警，黎庶亡干戈之役”^①的美好景象。北匈奴西迁后，不仅南匈奴降汉内附，就是北匈奴余众和东北地区的乌桓也纷纷入塞内附。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多被安置于包括河北北边五郡在内的长城内外地

《后汉书》卷 89 《南匈奴列传》。

区，与当地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为开发北方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全国各地一样，秦汉时期河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牛耕的普遍推广、铁器的广泛应用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发，垦田面积日益扩大，农作物品种有所增加，粮食产量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就是麦与稻的普遍种植。当时，不仅在河北中南部地区，而且在北部的渔阳地区也有了种植麦、稻并获得丰收的记载。至于铁农具，秦汉时期主要有耕地翻土用的犁、锄、铲、镢，除草用的锄，收割用的镰，以及用于耙地松土的三齿耙和双齿耙等。这些铁农具，近几十年来在河北各地均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在平泉县下店村、满城汉墓和石家庄市郊东岗头村都有一种巨型铁铧出土。石家庄东岗头出土的铁铧长 41 厘米，宽 46 厘米，重达 15 公斤。这种巨型铁铧，是牛耕与犁耕相结合的产物，既适宜于翻耕熟地，又有利于开垦新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农具。另外，由于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粮食贮藏、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家畜家禽饲养业的繁荣兴旺。河北各地出土的陶仓，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都设有通风的孔道。粮食加工工具，除普遍使用的碓以外，还有了石磨。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石磨，即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完整的石磨实物。就家畜、家禽而言，河北各地均出土有大量的陶猪、牛、马、羊、狗和陶鸡、鸭、鹅等。在定县中山王刘畅墓曾出土一件骑驼俑，可见当地还饲养骆驼，以用于运输。在河北各地出土的陶猪圈大多数都与厕所连在一起，说明农民养猪积肥、以粪肥田也是非常普遍的。

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有采矿业、冶炼业、纺织业、制陶业、

制盐业等生产部门。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时期全国各地共置有铁官 49 处，河北则有武安（今武安市西）、蒲吾（今平山县东南）都乡（今井陘县西）北平（今满城县北）涿（今涿州市）、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夕阳（今迁西县西南）等七处。另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时期河北“出铁”或“有铁”的地方仍然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五处。此外，在今兴隆县、内丘县西竖、沙河县綦阳村等地，均发现有汉代矿冶遗址。以铁制产品而论，无论产品种类还是产品数量都大大增加。各种铁制产品，包括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生产工具、兵器和日用器物等，在河北各地均有大量实物出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些铁兵器和铁工具，如中山王刘胜的佩剑和铁刀、铁铲、铁镢等，有的是应用表面渗碳和局部淬火的高新技术，有的则是采用了可锻化热处理的生产工艺，表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冶铁业一样，当时河北地区的冶铜业和铸钱业亦相当发达。在兴隆县汉代大型铜矿遗址，曾发现有四处冶炼场。其中有一处就设在山上，至少有五座熔炉。赵国的都城邯郸和中山国的都城卢奴，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铜器产地。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有不少就是在邯郸和卢奴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的。像铜错金博山炉、铜长信宫灯、中山内府铜钟等，则都是制作极为精美的珍品。近年来，邯郸、石家庄等地都有西汉“半两钱”和“五铢钱”钱范出土。石家庄所出钱范分大小两种，大者一次可铸 16 枚，小者一次可铸 14 枚，可见铸钱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河北的纺织业和制陶业更为繁荣兴旺。早在西汉中期，巨鹿即以盛产名缣著称于世。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巨鹿的陈宝光家就能织出一种很名贵的散花绫。在河北各已发掘的两汉墓葬中，曾发现绢、畦纹绢、罗纱、绮、罗绮、锦、起毛锦等多种纺织品

实物。满城汉墓二号墓出土的一块绣花绢，花纹绮丽清秀，还具有某种旋转运动感，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高超水平。河北各地出土的陶器，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制作技术之精，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的陶楼，通高达 216 厘米，外观考究，结构严谨，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楼阁式建筑的特点，在全国已发现的陶楼中实属上乘。由于河北濒临渤海，制盐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秦汉时期河北的手工业部门还有榨油坊、酱坊、肉坊、缝衣坊，以及酿酒业、染织业、漆器制造业、木器制造业和金属器、玉石器加工业等，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山国酿造的“中山冬酿”即系地方名酒，素有“醇酎中山，流湏千日”之誉。

在商业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河北各郡国的郡城、国都及众多县邑也大都发展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战国时期，河北各地的城邑已不下百余座，但大多数都是城堡和聚邑，只有赵国的都城邯郸、燕国的都城蓟和燕下都武阳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秦汉时期，各郡国的郡城、国都和众多县邑，如邺、邯郸、巨鹿、卢奴、真定、元氏、广平、信都、浮阳、沮阳、代、土垠、南皮、麀陶、清阳等，都具有相当的城市规模，既是当地的行政、军事中心，也是当地的工商业中心。其中蓟、涿、邯郸和后起的邺城，不仅是河北地区的最大城市，而且还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由于商业活动始终以城市为中心，各地之间的贩运贸易也就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西汉末年，吴汉“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①；东汉末

^①《后汉书》卷 18 《吴汉传》。

年，“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资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①，即是其例。秦汉时期，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则是“市”的普遍设置。当时，凡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必须在城市中某一特定的场所进行，这一特定的场所即称之为“市”。市的长官称市长或市令。在市内营业的商贾都编有专门的户口，称作市籍；他们按规定缴纳一定的营业税，称作市租。时人王符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②可见，一县之内并非只有一座城，市邑的数量比县城的数量还要多。据《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各大城市至少已有二三十个商业行业，吃的商品有谷物、果菜、肉食、水产、饮料、调料等，衣物有帛絮、细布、榻布和各种皮革皮裘等，烧的有薪、稿等，用的有竹木器、铜器和毡席等，交通工具有船、车和驾车的牛马等，手工业生产原料有竹、木、漆、丹砂等，奢侈品有各种珠宝、金器、玉器和远方珍奇异物等。有时，甚至连奴婢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据左思《魏都赋》，在邺城的市上就陈列着河北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土特产。其中，有雍丘（今河南杞县）之梁、真定（今正定南）之梨、故安（今易县东南）之棠、中山（今定州市）之酒、信都（今冀州市）之枣、襄邑（今河南睢县）之锦绣、朝歌（今河南淇县）之罗綾、房子（今高邑西南）之绵纩、清河（今清河东）之縑纈等。由此，可以想见河北各地市场贸易繁荣兴旺的景象。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秦汉时期，河北地区还曾出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秦代的著名将相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赵将冯亭之后。真定人赵佗，则是南越国的建立者。清河观津人奚婴，汉

《三国志》卷 32《蜀书》2《先主传》。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景帝时官至大将军，与太尉周亚夫等共同平定吴楚之乱；武帝初官至丞相，是当时极力推崇儒学的代表人物。燕人韩婴，汉文帝时为博士，著名诗学家，《韩诗》的开创者，撰有《韩诗内外传》数万言。《韩诗内传》已亡佚，《韩诗外传》尚存。河间人（一说鲁人）毛亨，著名诗学家，毛诗学的开创者，世称大毛公；邯郸人毛萇，师承毛亨，著名诗学家，毛诗学的开创者，世称小毛公。毛亨曾为《诗经》作注，毛萇又为之作传，是为《毛诗》。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后皆亡佚，唯《毛诗》流传至今。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西汉著名经学家、藏书家，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广川人董仲舒，西汉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以专治《春秋公羊传》著称于世，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他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改造和发展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并为汉武帝以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从而把儒家思想推上独尊的统治的地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邯郸人吾丘寿王、无终人徐乐，皆为汉武帝时期的著名政论家。涿郡蠡吾人赵广汉，汉昭帝时官至京兆尹，在当时是极负盛名的治安专家。代郡人五鹿充宗，西汉经学家。汉元帝时令诸儒讲《易》，五鹿充宗为其首。魏郡人许淑，西汉经学家，著有《左氏传注解》一书。涿郡蠡吾人王商，汉成帝时官至丞相。勃海高成人鲍宣，汉哀帝时官至谏大夫，好学明经，为天下名儒。魏郡元城人王莽，西汉末年长期专擅朝政，后代汉更立新朝，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涿郡安平人崔骃，东汉文学家，“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故百家之言，善属文”^①，与班固、傅毅齐名。崔骃之子崔瑗，

① 《后汉书》卷 52 《崔骃列传》。

亦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崔瑗之子崔寔，则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所撰《政论》一书最为世人所称道。涿郡涿县人卢植，东汉末著名儒学大师，公孙瓒、刘备皆从其学；曾与蔡邕、杨彪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撰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涿郡人高诱，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撰有《孟子章句》、《孝经令》并曾为《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作注。河间人张超“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①，也是东汉末年的大书法家。巨鹿人张角，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涿郡人刘备，则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政治家。涿郡人张飞、常山人赵云、河间人张郃、右北平土垠人程普，也都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

综上所述，可见秦汉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极为丰富多采，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河北的历史，认真总结河北地方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这对于我们鉴往知来、扬长避短，加快河北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①《后汉书》卷 80 下《文苑列传》下《张超传》。

第一章 秦统一后的河北

第一节 秦攻灭燕赵的战争

一、秦攻灭赵国的战争

战国末年，河北地区主要分属燕、赵两国。伴随着燕赵的覆灭和全国的统一，河北地区亦同时纳入秦帝国的版图。

自前 260 年长平之战失败后，赵数为秦所蚕食，国势日渐衰败。至前 244 年赵悼襄王即位时，赵国仅余邯郸、中山、河间之腹地和云中、雁门、代诸边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时的秦国“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这样赵国实际上已经处于秦国的两面夹击之中。前 238 年，秦王嬴政镇压了宦官嫪毐发动的叛乱；次年，又罢免了相国吕不韦，遂开始亲理国政，重用尉缭、李斯等人，着手制定和实施兼并山东六国的计划，并且将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赵国。

前 236 年，燕、赵两国发生战争，赵悼襄王派遣名将庞煖率领大军攻燕。秦王政便利用赵军主力北上伐燕、国内空虚的机

会，命王翦和杨端和等分率两路大军夹攻赵国。赵军向燕国发动进攻之际，王翦即兵出上党，攻占了赵国的阝与。庞煖继续挥师北上，攻占了燕国的狸（或作厘，今任丘市东北），秦将杨端和等则乘机攻占了赵国河间一带的六个城。当庞煖攻占燕国的阳城之时，秦将王翦、杨端和等又合军攻占了赵国的邺（今临漳西南邺镇）安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庞煖回师南下救援时，河间各城及漳河流域已全部为秦国所有。经过这次战役，赵国的国土、国力大为削弱，国都邯郸日益孤立。不久，赵悼襄王即“不得意而死”，其子赵王迁继立。赵王迁比他的父亲更加昏聩无能，愈益加重了赵国的政治军事危机。

前 234 年，秦王政又大举兴兵攻赵。首先，他派军队占领了赵国的北地，设置了雁门郡和云中郡。同时，又派军队攻占了赵国的平阳（今磁县东）、武城（今山东夏津西北）。赵王迁急派将军扈辄率军抵抗，仍遭致惨重失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役秦军“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可见双方战斗相当激烈。

第二年，秦王政又派军队出上党越过太行山直取赵国的赤丽、宜安（今石家庄市西南），企图从北面完成对赵都邯郸的包围。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王迁只好任命李牧为大将，从北部边防上抽调李牧防守匈奴的军队回来抵抗。李牧为战国名将，曾经多次战败秦军，其所率军队亦系精锐之师。他挥师南下，向秦军发动猛烈反攻。双方军队在肥（今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李牧大败秦军，因功被封为武安君。次年，秦王政又派军队兵分两路大举伐赵，一路攻邺，一路出太原越过太行山直取赵国的番吾（今灵寿西南）。赵王迁复派李牧组织赵军抵抗，再次将秦军各个击破。李牧虽然取得胜利，但兵力损失亦极其严重。据《战国策·齐策一》是时“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因

此，李牧这次战胜秦军，也只不过是暂时挽救了赵国的危亡而已。

前 231 年，代地发生了大地震，自乐徐（今涞源以西）北至平阴（今山西阳高县东南），台屋墙垣大半颓坏。次年，赵国又发生旱灾，民众大饥。于是，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道路纷纷传言：“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①再次年，亦即前 229 年，秦王政复命王翦、杨端和分率两路大军大举攻赵。王翦率领上地兵直下井陘（今井陘西），杨端和率领河内兵进围邯郸。赵将李牧、司马尚团结赵军将士奋力抵抗，与秦军相持达一年之久。后来，秦国人用重金收买了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让他向赵王迁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迁信以为真，派人收缴李牧的兵权。李牧不服，拒绝交出兵权。赵王迁乃暗中派人逮捕李牧，并予以处死。同时，亦废掉司马尚，改派赵葱和齐人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死后，赵军的防御只维持了两个月即全面崩溃。第二年，亦即前 228 年，王翦等大破赵军，攻克赵都邯郸，杀赵葱，俘虏颜聚和赵王迁，赵国遂宣告灭亡。

赵国灭亡后，赵公子嘉还率领宗族数百人逃到原先赵国的代地，自立为代王。代王嘉与燕国连兵，维持了六年。前 222 年，秦将王贲灭燕以后，又回师攻代，俘虏了代王嘉，在那里设置了代郡。

二、秦攻灭燕国的战争

秦将王翦破赵之后，即屯兵中山，准备进攻燕国。燕王喜和他的大臣皆惶恐不安，太子丹便选派勇士荆轲去刺杀秦王政，

^①《史记》卷 43 《赵世家》。